

笹川裕史、奥村哲，《銃後の中国社会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》
東京：岩波書店，2007。273頁。

王超然*

—

戰爭為升斗小民帶來的悲劇與殘酷，為人類歷史慣見現象。至近代隨著戰爭規模擴大與武器技術日新月異，不但前線的傷亡人數劇增，後方也因國家對人力、物力與財力的需求擴大，使得社會動員幅度達到前所未聞的新高，致使現代戰爭中的悲劇與殘酷也變得更為頻繁與持續，而成為值得再三省思的歷史課題。

八年抗戰不但促使中國的國家機制進入轉型，也連帶影響社會發生新變化，特別對鄉村的農民而言，這段期間經歷的災厄，並不因中國成為戰勝國而減少，甚至有可能遠勝於日本。然而，農民因戰爭承受的苦難，過去的抗戰論述中似乎較少提及。我們習以為常的大後方社會，往往是類似《未央歌》或者「十萬青年十萬軍」，種種寓有浪漫化、理想化的愛國樂觀主義論述；在全民一致擁護國府抗戰的主軸中，有關「拉伕」、「飢民」、「逃兵」、「國家暴力」、「社會抗議」等課題，則被隱藏在角落中。野坂昭如在1960年代撰寫二戰末期日本社會景況的小說《螢火蟲之墓》（火垂るの墓），自1988年被改編為電影後，在日本國內外形成不小的反響。觀眾對小兄妹因戰爭承受的殘酷而心生憐憫之際，促使我們反思人性之惡，也感受到日本的一般民眾所承受

*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博士後研究人員

的代價。但電影主人翁的遭遇，並非戰敗國日本獨有，類似的真實事例亦充斥於戰勝國中國的大後方農村社會，要找出更加殘酷與悲傷的實例，也不是沒有可能。換言之，抗戰期間大後方的農村社會，經歷了哪些磨難？背後的歷史意義為何？沒有獲得學界足夠的關注。

日本學者笹川裕史與奧村哲在 2007 年出版的《銃後の中国社会：日中戦争下の総動員と農村》一書，正足以彌補上述的不足之處。作者將研究重點置於國府在大後方最重要的根據地——四川的農村社會，探討國府的戰時總動員對此處造成的各項影響。作者的焦點，並非當時的軍政領袖人物例如蔣介石，也不是那些為民族興亡、奉獻金錢與生命的愛國志士，而是在農村與現實搏鬥的芸芸眾生。作者透過四川省府檔案、文史資料等，發掘出農村因為徵糧、徵兵而引發的各種爭端、訴訟與陳情案件。藉著一個個事例提醒讀者，不能從單一觀點探索歷史，因為許多「實態」往往需要各方面的資料彙整，方能發現眾多被掩蓋的歷史層面。

透過作者的描述，讀者能夠感受到國府統治的侷限性，並能反思戰時國府中央化的有效性達到何種程度，以往研究是否有過度評價的問題存在。此外，也更能夠瞭解到戰時的農村社會，在承受國家長期且持續加強的動員後，社會結構已產生質變，並造成農村秩序的混亂，促使貧富兩極化的擴大，也影響了國府在一般農民心中的地位，成為日後中共利用階級鬥爭動員群眾的資本。換言之，四川農村居民形形色色的戰爭經歷，也許更能代表大後方社會變化的實態，也能從中探索中國國家與社會結構的特性與矛盾。

作者將本書定位為較為通俗性的歷史讀物，並以日本的大學生為設定對象，希望在近代日本史為對照的基礎上，引導讀者了解中國近代歷史發展。就此而論此書具有一定的效果，既可提供基本的認識架構，也可開展不同的視野。對於中文讀者而言，雖然作者談論的課題，對專業研究者而言或許並不陌生，但是我們可以試著由外人的角度，思考他們是如何看待抗戰時期大後方的政治社會史，也可從中發現我們過去研究角度的疏漏。

二

本書的特點，就是將研究焦點由重慶轉向農村，由高層菁英移至基層的芸芸眾生，並呈現出國府推動戰時徵調對農村造成的各式衝擊，以及在農村生活的人如何在此格局下尋找他們的生存之道。讀者透過檔案與文史資料中選出的各種「故事」，能夠見到國府的抗戰建國大業在基層實際執行的「實態」。讀者藉此可以理解到「理想」與「現實」的差距，亦即國府的政策在基層社會實際執行時，在過程中存在許多扭曲與變形。作者用意並非僅是要展示殘酷，或藉此批判國府「暴政」，如同中共早期的抗戰論述一般，強調國府根本無心抗日，各種戰爭動員只是高層人物為滿足一己私欲的橫征暴斂罷了。相反，作者著眼於更深層的結構性問題，在以近代日本國家形成史為對照之下，指出國府的戰時動員在農村造成那麼多殘酷，是因為當時的國家與社會結構中隱含著許多矛盾與弱點。

作者指出日本的國家近代化，早於明治初期就開始進行。日本在 1871 年（清同治十年）推動戶籍整理，到 1874 年即在此基礎上實施徵兵制。此外，明治政府在 1873 年開始進行土地稅改革（地租改正），至 1880 年宣告完成。1886 年，明治政府在以天皇制意識型態（天皇制イデオロギー）為理念基礎上，推動全國義務教育；加上大眾傳媒的幫助，強調犧牲個人自由意志、以集體利益優先、為了國家獻上生命等的理念，向社會傳播。因此，中、日至 1937 年進入全面戰爭時，日本的近代國家化至少已推動近七十年。而反觀中國，相關機制不是方為起步，就是尚未推行，對社會的控制力可說是相當薄弱。

此外，日本的傳統社會具有「村社會」（ムラ社会）的特性，亦即強調集體性利益，村民對村落具有應盡的義務，也須遵守規範，個人一旦被排斥於集體之外，等於失去生存的資格。因此，在村存在高度組織的狀況下，家家戶戶的人口、土地擁有面積、糧食生產數量、勞動力情況等，都能被村共同體掌握。而當各地的村社會被整合為國家的一部份時，日本政府自然可以清楚地掌握農

村社會人力、物力、財力情況，而推動戰時徵調亦可做到相當精準的地步。相較於日本，中國傳統社會組織性低落，村對於村民的規範性不高，居民以宗族、秘密會社、宗教結社方式等，形成一個個的小團體，並沒有以「村」作為基本的認同，可說是處於「一盤散沙」的狀況。

作者以日本為例，指出國府無論在國家近代化與社會的組織性都有缺陷，而擴大戰時徵糧額度、推動徵兵制又勢在必行；此導致實際執行後，不但弊端重重，並對社會造成許多惡劣影響。作者以此為主，將全書分成四部份，分別以「徵糧」、「徵兵」、「國家徵調與基層權力結構的變化」，以及「國府的補救與侷限」為主題，探討國府在基層推動徵糧、徵兵後，實際發生的狀況為何？對於基層權力結構的影響，以及國府面對社會民怨的補救措施，為何實際效果不彰。

作者指出，日本的戰爭動員可達到全面的精緻程度。以徵糧為例，日本政府在 1942 年 2 月正式推動糧食管理後，可以做到禁止糧食進入市場，而每戶除了基本消費量外全部上繳國家。因此，在戰時糧食管理時期（1942 年至 1945 年），國家可以掌握全年生產量的六成之多。相較於日本，國府在農村的徵糧工作則是相當粗放。國家在缺乏社會組織協助之下，無法摸清楚農村的底細，只好向下撒一張粗網（目の粗い網），先求盡量拿到糧食，解決國家的燃眉之急。因此，在徵糧的過程中，就會造成有力者瞞產、逃稅、負擔不公、攤派等狀況。對於貧苦百姓而言，國府推動田賦徵實，既增加家庭的財政負擔，而且親自扛著實物交給政府，等於是額外的力役負擔，既費時費力，又無任何補償，還受到稅吏的刁難與訛詐。許多家庭因為無法承受過重的支出，導致一無所有，無東西可吃；在抗戰晚期，甚至出現四川的飢民成群結隊攻擊運糧隊搶奪糧食之事。

國府在抗戰初期，倉促推動前所未有的徵兵制，由於對農村的掌握度不夠，不能精確地掌握到農村每一個可徵調的壯丁，即使訂定各種徵兵原則，但是當國家需要的員額配到基層時，基層幹部為了完成任務，又不想得罪地方有

力者，實際無法照章辦事，導致亂象叢生；例如將員額攤派到貧苦家庭之上，或找人頂替，要不就是任意拉伕。總之，徵兵如同徵糧，同樣在基層造成混亂，甚至引發民眾抗爭事件。這些混亂，既反映出國家與社會兩方面的缺失，也顯示要扭轉社會對於「兵」的歧視並非輕而易舉之事。宣揚國民是國家的一部份、當兵是一種義務，國家有難時，為國犧牲是一種高尚的道德等觀念，需要國家長期透過教育等方式灌輸給一般民眾，並且配合強制手段，在軟硬兼顧之下讓大眾不得不順服，從而接受服兵役是理所當然。國府沒時間也沒機會長期經營此工作，而民眾在心理上也沒做好準備，在此情況下出現各種殘酷與悲劇，也是可預料之事。

國府的戰爭動員，對農村造成的衝擊是全面性的。首當其衝的是農村弱勢者，如自耕農、貧農、佃農與小地主，他們成為徵糧與徵壯丁的主要對象，導致生活惡化。但是，相較於貧困人的悲劇，農村的有力者，為避免被沈重負擔壓垮，導致社會地位降格，也必須用各種方式，例如結交權貴、拉幫結派、金錢賄賂、司法訴訟、建立私人武力等手段，維護自己的權益。因此，整體而言，國府對農村的戰爭動員，一方面造成貧者越貧、富者越富的趨勢，而形成農村中貧富對立趨勢日益滋長；另一方面，即便是有力者也面臨了生存的難關，要不就是選擇同流合污朝土豪劣紳之途前進；要不就是承受不了負擔，導致家道中落成爲社會中的落敗者。換言之，農村在國家派下的戰時負擔前，無論貧富都必須想辦法生存下去，加上國家無力主導農村秩序，致使農村中出現各種殘酷、悲劇與混亂現象。

國府面對此狀況，並非麻木不仁的掠奪者，他們原就抱持「公平負擔」原則，也不樂見因爲戰時動員造成社會對立嚴重，進而導致社會秩序崩潰。因此，國府推動戰爭動員之時也有相關配套措施，例如設置針對出征家屬的優惠措施，以減低徵兵對農村社會衝擊；推動新縣制，加強國家對社會的控制力，提升社會的組織性；並建立常設性的地方民意機關，讓社會有發聲的管道。但是這些措施在實際執行上，也如同徵兵、徵糧一般，許多良法美意往往僅成具文，

而基層或在現實上並無力執行，或居於現實考量而擱置不理，甚至便宜行事適應實際狀況。

換言之，國府推動戰時動員，徵糧透過田賦徵實、徵購、徵借等方式，在 1941 年至 1945 年間，每年由四川農村獲得的糧食，不但較戰前為多，而且年年上漲。至於徵兵則在抗戰八年中，由農村中動員到近 260 萬人，雖然有一定成績，但同時也在社會造成許多惡劣影響。追根究柢，就是因為國府在戰前的國家近代化措施、社會的組織性低落所造成，國府即便在戰時採取各項補強措施，也終究事倍功半。

三

本書對兩岸與西方史學界對類似課題的討論有其貢獻。台灣學界長期以來的大後方論述，大多以一人一城（蔣介石、重慶）為焦點，習以為常的論述就是國府在四川的統治非常成功，而四川民眾也相當支持重慶政權。但是，這樣的論述方式，往往無法解釋國府在四川既有豐富的感情基礎，又有穩固的統治經驗，為何到國共內戰時期，四川民眾沒有堅定站在蔣介石背後支持他進行另一場戰役，反而是讓共軍輕易進入夔門？換言之，四川民眾迅速「變心」的理由為何？作者透過此書告訴讀者，並非中共比國民黨高明，而是國府的戰爭動員雖然等到戰爭勝利的結果，但同時也拖垮了四川農村，此為戰爭動員的後遺症，國府並未處理好此課題。同樣的，近來西方學界對於國府在抗戰時期的「國家建構」（state-building）的評價，有一定的程度轉變，由早期易勞逸（Lloyd E. Eastman）強調國府統治的敗壞與無能，到柯偉林（William Kirby）、朱莉（Julia Strauss）與卞曆南（Morris Bian）的研究，轉而正面肯定國府戰時的國家建構工作；但是本書透過此提醒讀者，國府的抗戰建國有其成績，但其侷限也是相當的大，可能需要從多面的角度切入並綜而論之，才能得出較為公允的論斷。

作者的論述固有引人深思之處，仍有值得進一步討論的空間。如作者由國家與社會兩方面，討論國府在戰時推動國家近代化的不足之處易流於公式化，而忽視了歷史的複雜與多元化。在作者的論述中，國府彷彿鐵板一塊，對於任何政策的推動與制訂，有著高度共識與決心，即便出現問題，也是落實到社會層面後才出現。作者忽略了國府在 1927 年建立後，最大的結構性問題為：其是由各方軍政勢力組成的「聯盟政體」，蔣介石雖是實力最強的一系，但其「共主」地位是直到 1938 年才被各方認可，而且並不如表面穩固；抗戰時期的國府高層政治，也是暗潮洶湧不斷。故此，國府政權結構的多元與歧異性，對其推動「國民國家化」有何影響？應該被考慮進去，不能全然地忽視。

再者，作者指出了國府對社會控制力不足，固然有一定道理，但卻沒有指出一個重要的歷史事實，就是直到抗戰爆發之前，國府還在為全國統一奮戰，除東南沿海地區外，各地有著大小不一的地方軍人，或明或暗地抵制國府的統一政策。作者分析的四川，在戰前長期為地方軍隊所掌握，中央根本無法控制此地。嚴格地說，國府真正治理四川，應該是從抗戰時期開始。因此，四川的國家化才開始，就伴隨著擴大徵糧額度、徵集壯丁出川作戰，在根基不穩的狀態下自然會引發社會反抗。

但是，國家控制社會的根基不穩，不等於治理推動一定困難，例如有強大的軍隊可以鎮壓社會反抗，則歷史將走向不同的方向。但國府治川除了根基不穩外，另一個致命傷就是缺乏軍隊坐鎮。作者以近代日本國家化為對照，其呈現的歷史經驗，彷彿日本政府因為得天獨厚，各項政策向下推廣，使各地的村社會逐漸地轉為國家的一部份，是一個長時間的和平演變過程，卻沒指出一個強大的中央軍在此過程存在的重要性。實際上，明治政府在 1870 年初期，推動一系列的地籍整理、田賦改革以及徵兵制，除引發農民抵抗之外，最主要的抵抗者是舊式武士階層（士族）。明治政府推動的一系列政策，都與士族的利益相抵觸，並且刻意地削減他們對於社會的影響力，引發舊武士階層的不滿，與政府的對抗成為白熱化。最終，以西鄉隆盛為首的舊武士，在 1877 年發動

史稱西南戰爭的武力叛亂，為日本史上最後的內戰。政府以優勢軍力，經過近一年時間打敗叛軍，也奠定了中央政府的權威。因此，如果日本政府沒有在西南戰爭中獲勝，則近代日本的歷史將有不同的方向。相較之下，國府在四川的統治，始終缺乏一場決定性的「西南戰爭」；中央進入四川，並非征服者姿態掃平地方軍人，而是被迫入遷重慶，故當地的原本軍政結構並沒多大變化。因此國府在當地推動徵糧、徵兵，除了農民外，亦觸動到當地軍人的根本利益，成為中央政策最大的障礙。但是，這一點是作者始終沒有指出的。

最後，作者點出中共在 1950 年的徵糧成績遠比國府出色，除了是因中共的國家控制技術比國府來得精鍊之外，國府時期在社會造成的貧富對立氛圍及對「社會公平」的要求，也讓中共以階級鬥爭為理念取得民眾認同，使得他們如魚得水。但作者忽略了一件事，社會不滿與貧富對立，固然是左派可以大大發揮的溫床，但不表示就可因此掌握政權，進行各種國家政策。相較於國府，中共是採用軍事征服的方式進入四川，共軍不僅擊敗了中央軍，也同時消化了地方軍。此後，中共推動徵糧，引發各地有力者的叛亂，共軍又無情地大力鎮壓，基本上將反抗者一掃而空。接著，又透過鎮反、土改，將地方殘餘的有力者清除，使貧、僱農等基本群眾進入體制，成為忠於黨國的地方基層幹部。也就是說，中共透過軍事征服，以及其後的政治鬥爭全面改變社會結構，其意義不但等同於日本的西南戰爭，甚至超越許多。故此，如果沒有注意到國府、中共如何進入四川的方式，其展現獨特的歷史意義，以及軍隊在近代國家化的重要性，則不能夠充分解釋國府國家化與日本及中共的不同之處。